

科学与人文的划分,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玉渊杂谭》》

## 反感阅读立法没道理

文·句艳华

最近,媒体报道了关于阅读已进入今年立法工作计划的消息。据悉,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具体内容应包括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设立国家全民阅读节,制定全民阅读规划,建立国家阅读基金,建设全民阅读重点工程等。

这条本应喜悦和称道的消息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对之声。有人说,常回家看看立法已经够大方,不看书也违法?既然读书要立法,那吃饭要不要呢?这种看法不免有只看表面,断章取义之嫌。

才不曾经写过几个短文,极力鼓励读书,虽出言宏大,其实无非是自勉。自身的惰性,冗杂的生活,将曾经有读书习惯的我“改造”成了一个不读书之人,短期内并无异感,但时间一长,自觉言谈乏味,下笔窘迫,人亦庸俗。尽管在生活中

有所体会,但当我惊讶地发现国人人均读书不足4本时,才明白自己这种情况已经变为大多数国人身上的常态。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正在远离书籍,或被生活的数座大山压倒,或被浮沫一样的消费文化淹没。

声名赫赫、拥有无限好奇心的企业家马云先生就曾公然说道:“不读书和读书太多的人,都不太会成功,所以别读太多书。”这种庸俗的成功观为整个社会不读书的人完成了代言。所以马云去“大师”处探索宇宙奥秘也就不必惊奇了。

少数人的劝诫呼吁已难成势,期待人们的自我醒悟也有些耽于幻想。现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寄望国家层面能有所动作。近年来,两会上对此建言声不断就是在表达这种诉求。这次,它真的要来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以

义务教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为例,法律干预私权并非没有先例,国家立法促进读书在国外也同样不乏先例。

另一方面,法律有强制性的,也有指导性的。观察这个阅读促进条例会发现,其中更多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强调政府的投入、组织和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借此条例,拥有更多的图书馆,而书架上,也可能不再会摆满了成功学、宫斗、网游文学等等只能让人精神低下的垃圾书。

自从互联网普及后,我们就诞生了一种名叫“网民”的新物种,其中有不少在野高人,但也不乏大批的“没头脑”和“不高兴”。那些对阅读立法大肆进行嘲讽的网民们,是否可以不那么“标题党”,是否可以读完正文内容再下结论?

还有一些人,或许也快速浏览了正文,他们

的论调是,要想让人们追求尊贵的精神生活,必须先解决他们的现实焦虑。这种说法有合理成分。在一个流氓逻辑大于真理,处处投机的社会氛围中,人有时候确实会抛下精神不管,而活在最虚浮的表层。但我想,这也许正是因为人们读的书太少,获取的知识不够。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难道不需要用知识来武装自我,以图改变现状?

当然了,寄望于一个立法计划就能很快改变现状,也不现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让坚冰融化同样需要持续的热量供应。我们需要做的是,密切关注这个与我们的阅读生活即将产生关系的条例,并能为其的完善做出一些理论上的努力,比如让它如何更加人性化,更加具有操作性,如何不大而无当却脚不沾地,掉入形式主义的大坑。

人物纪事》》

文·吴国盛

## 怀念新和



作者与胡新和(左)2012年7月25日在雅典的合影

新和的突然离去带走了他的世界。然而,他的世界是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亲朋好友们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的世界的突然消失,撕裂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世界出现巨大的空洞,甚至一时黯然无光。于是,无比巨大的被撕裂的痛楚,生活的无意义感从四面八方袭来。悲伤笼罩着我们。怀念只是为了抚慰。

我和新和的相识、共事、相交始终与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说来,是与全国科学哲学学术年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密切相关。我们在1983年9月香山召开的第3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第一次相遇,在1985年5月香山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熟识。那时我们都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新和已经先一年来此工作。第8次(1997年,武汉)的工作。新和来哲学所早,离开得晚,参加了自第4届(1985年,北京)以来的历次会议的筹备和会议组织工作。在1999年广州召开的第9届会议上,新和担任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9年武汉召开的第14届会议上被推选为主任(理事长)。可以说,近二十多年来,新和一直是中国科学哲学学术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是寄托了新和和我这代人学术理想的一份杂志。1980年代,它曾经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也是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界学术品位的示范基地。我们的处女作都发表在这里,1985年香山会议也是《通讯》杂志社主办的。1990年代新和和我曾经一度兼任杂志哲学栏目的编辑。2001年他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之后,开始介入杂志的编辑工作。2009年被任命为杂志主编后,更是把重振杂志雄风,再现昔日辉煌作为自己的使命。新和多次私下跟我表示,从人文学院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杂志上,要守护好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家园。言犹在耳,人天两隔。每念及此,悲从中来。

新和是我厚道的兄长。1987年的成都会议期间,他带领我们几个小青年做会务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在杜甫草堂门前会餐。因酒后与邻桌青年发生口角,最后引发了斗殴。结果是打坏了十几个板凳,引来了派出所民警,以赔偿店家损失告终。新和一直非常理性地劝架,反而被打坏了牙齿和手表,而其他人均未受伤。我相信正是他保护了我们这些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兄弟。

新和是我的学术同道和战友。1980年代中期前后,有一群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聚集在《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们(许良英、范岱年、赵中立等)周围,思考和争论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中国的未来,新和和我也活跃在这个“爱因斯坦学派”之中。我相信,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学术生涯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我们对学者的使命、学术的品质有共同的体认。1992年1月,我参与创办了新和一直主持的“北京科学哲学论坛”,第一次报告就是我做主讲的“论宇宙的有限无限”。1994年,新和积极支持我组织了长沙西方自然哲学史会议。2002年,他把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新译本交与我主编的“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出版。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在学术上相互支持,在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心照不宣,在针砭学界恶劣风气和社会黑暗面时爱憎分明、同仇敌忾。

新和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谦谦君子。新和谦和、低调、平静、稳重,但他内心其实满怀激情。开会聚会时,他从不急于发言,但一开口却总是满含幽默和俏皮。1985年的香山会议是我们这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者难忘的盛会,不仅因为这次由研究生们自己组织的会议,思想极其开放、观点极其尖锐,而且因为会议气氛极为热烈和活跃。我记得在会后联欢时,新和和我高唱贝多芬的欢乐颂,把场面气氛推向高潮。在此后数十年的多次聚会时,新和多次跟我提到那个场景。现在想来,这首欢乐颂的确可以表达新和对学术的热情、对中国科学哲学界同仁的感情。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我抄下这首席勒的诗,献给新和在天之灵,愿你在天堂永享欢乐。

编后 胡新和是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的多年好友,原为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曾翻译库恩的书籍《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今年5月,胡新和教授突发心脏病而逝,年仅58岁。作者几次撰文追念,我们也可借此文感受这位学者的治学为人。

## 超越时空的对“画”



像塞纳河上洗衣服的船而得名,当年是一些流浪艺术家的聚会场所,也是各种新思想和新风格诞生的“作坊”。艺术家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慕名而来的各色人等闲聊侃谈的话题,除了前卫艺术,常常还有诸如第四维、空间几何学、 $n$ 维连续统等等新玩意。

就在这一年,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于美国发表的演讲,已经预见到一个“变化即将到来”的世界。其中最明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新进展,比如飞机、汽车、X射线、无线电报和电影艺术的出现及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此时在洗衣船这个小地方,庞加莱的见解一度成为画家们的热议话题。按照庞加莱的解释,既然二维面的一个景象是从三维面而来的投影,那么,三维面上的一个形象也可以看成是从四维面而来的一个投影。庞加莱提出,可以将第四维描述成画布上接连出现的不同的透视图。

画家们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都尝试通过同时展示许多不同的透视图去表现物体。他们也隐约感觉到,那些奇妙的数学和空间新观念对他们的艺术创作来说,似乎包含着一种新美学或新技法的种子。这艺术中的科学层面自然没有逃过毕加索的眼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同的透视图应该在时间“同时性”里展示出来。可这又该怎样去表现呢?

1907年3月至7月间,毕加索一头扎进洗衣船的一个画室里,处在某种新事物的临界点上,经历了一番“可怕的精神孤独”和无尽的焦虑与煎熬。这种新事物是他全身心渴望着的,也绝对是突破性且惊世骇俗的。在创作过程中,他完成了上百件草图与习作,并不断地调整作品里的相

关形象,还有其姿势与造型,终于绘就一幅超越时空视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亚威农少女》。

这幅巨作描绘的是巴塞罗那一家妓院的5个妓女,整个构图极具几何张力和视觉冲击力,同时又显出一种新奇、粗俗的立体感与错乱感。画中,看上去令人惊愕、姿势和神态各异的少女们都是浇铸出来的雕塑,其中一张脸(左边第二人)的正面同时画上了左鼻孔、右耳朵和两只眼睛——这是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情景。而右坐着的那个扭曲、变形的少女,乍看让人简直分辨不清到底是正面、背面还是侧面?

《亚威农少女》这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开始并未为人们所理解,曾一度招致很大的误解和批评,甚至还有传言说画家已经疯了。的确,它以一种近乎几何形的构图法,将多种艺术流派的影响和观念融入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中,创造出一种与客观对象截然不同的新形态,构建了一个奇特的视觉世界,从而结束了用单一视角表现空间的模式,展现了所有视觉形式的可能性。这又导致日后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绘画风格——立体主义(立体画派),直至发展到最后的完全抽象主义。这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的绘画艺术传统,使



《亚威农少女》里的视觉形象,是通过几何语言来表现的。毕加索为其新艺术形式构思出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观点:将一切还原成几何图形。即同时表现完全不同的视点,这些视点不同的总构成被描绘的物体。

科林碎语》》

## 择师漫议

文·张煌 刘峻涛

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孔丘先生就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丘一生有3000弟子,72贤人,从为师的视角看,已臻登峰造极之化境,然而他对于如何择师的见解,仅仅是以“善者”二字概括,未免有略显笼统之嫌。

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选择名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获奖致辞中指出:“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事实上,在塑造人类文明的一个知识领域,择师都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绝难用简单的言辞来表述。

单就科学史而言,选择老师既是师徒传承的起始,也是科学世代繁衍的纽带。不可否认,许多科学家在其科研工作的起步阶段,就能够得到名师指导。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历史上,不乏塔特姆与莱德伯格、巴丁与施里弗以及海姆与诺沃沃洛夫等多组师徒共同获奖的案例。与之相

对,择师出现失误的反例亦是大有人在。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早年留学美国时,选择以实验见长的爱德华·泰勒为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耗费了20个月的光阴,无奈因动手能力太差致实验工作难有寸进,却留下“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的科研轶事。

择师过程中的曲折与艰辛,即便天才高若杨振宁者亦难幸免。由此也可推知,成功择师者绝不仅是凭靠运气。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通过对近百位诺奖得主的访谈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后来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不仅善于识别那些在其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主要大学和学系,而且善于识别适合自己的老师。

恩里克·费尔指导的一位诺奖得主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很多同学选择教授的方式很可笑,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教授有真才实学。他们很无知,而我绝不是无知的。”对于选择费尔作为导师的原因,他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我仰慕他的名字,我有足够的物理知识来欣赏

他和他的工作方式。”这一解释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在仰慕名字与欣赏工作方式之间,后者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学徒对于未来师傅的追求,固然要考虑师傅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名气和威望,更要考虑自身的兴趣特长能否与师傅的研究领域相匹配,自身的能力素质能否得到师傅的认可,自身的性格特征能否接受师傅的研究风格。

客观而言,并非每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都如卢瑟福、玻尔、费米一般,在育才方面能够做到桃李满园。作为导师,朗道、费曼等科学家终其一生也没有培育出同样出色的弟子。因此,学生选择老师,不仅要关注他们从事科研的能力,还需要考量他们在从事科学教育的能力。

俄国物理学家卡皮查在谈到他的老师卢瑟福时曾说:“他的思想和人品吸引着年轻的研究生,而他作为教师的能力有助于每一位研究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我能记起除他之外,没有一位当代科学家在实验室培养出这么多卓越的科

家。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不是一个伟人,但一位伟大的教师必须是一个伟人。”在卡皮查看来,唯有将科学家与教育家集于一身,才堪给予伟人的称谓。

从辩证的视角来看,择师的过程与选徒的过程是相互对应、彼此统一的。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和他们可能的师傅之间存在彼此吸引的过程,无论是徒弟还是师傅都在积极地寻觅有才能的科学家然后与之一道工作。

意大利物理学家塞格雷在自传中,回忆了一段在伯克利的任教生涯:“在光学课上,有个学生总爱从讲课中挑刺,以此为乐,常常有根有据,显示出他的批评意识和灵活脑筋。我很欣赏这位年轻人,显然他不仅对课程感兴趣,也真正动脑思考了,我和他结为朋友。”他所提及的这位学生,就是与他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欧文·张伯伦。

从某种意义上看,择师是和择偶一样,都是相互追求的过程。